

声音、听觉与脑文本：《达洛卫夫人》中的声音景观研究

Sound, Listening and Brain Text: A Study on the Soundscape in *Mrs. Dalloway*

申富英 (Shen Fuying) 魏 瑾 (Wei Jin)

内容摘要：《达洛卫夫人》是一部充满声音的小说，但鲜有学者系统研究这部小说中的声音景观，特别是声音景观的形成机制问题。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和脑文本理论，可以发现《达洛卫夫人》中声音景观的生成机制和美学价值。作为小说人物生活环境中的主调声音，伦敦街头的喧闹声不断规训人的潜意识，形成现代交通工具和商品社会等于繁荣与幸福的脑概念；大本钟发出的声音成为每个人物借以校准自己活动的标识，是一种对脑概念进行规训的强大力量。人不仅是声音的听者，还是声音的反应者，而这种反应也是脑文本的具象化和外化。达洛卫夫人对爆胎之音的误听、赛普蒂默斯对爆胎和飞机之声的屏蔽以及赛普蒂默斯对“kyar”“Kay”和“Arr”等声音的极度敏感，均可以充当反映一战对英国人造成的典型的创伤性后遗症的镜子，也是战争之音所形成的声音脑文本的具象化。小说人物还通过对声音的情感倾向和主动阐释，逐渐强化自己的情感认同，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赛普蒂默斯对家庭日常生活之声的享受过程，也是他的情感认同过程；彼得和雷西娅对老妇人之歌的阐释过程，也是他们逐渐明晰自己的情感认同和决定自己的伦理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达洛卫夫人》；声音景观；脑概念；脑文本；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申富英，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魏瑾，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研究”【项目批号：18RWZD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Sound, Listening and Brain Text: A Study on the Soundscape in *Mrs. Dalloway*

Abstract: *Mrs. Dalloway* is a novel full of sound, but there is scarcely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oundscape, especiall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undscape, in the novel. Prof. Nie Zhenzhao'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of brain text can help to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soundscape in *Mrs. Dalloway*. As keynote sound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e noise in London streets continuously disciplines people's subconscious and forms their brain concept that modern society featuring in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odity equals prosperity and blessing. The sound of Big Ben plays the role of the sound mark for everyone to arrange his or her activity and is in fact a powerful force to discipline people's brain concepts. Humans not only listen to sound, but also respond to sound. And such responses are the externalization of brain texts. Mrs. Dalloway'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nd of the explosion of the tyre, Septimus' failure to hear the sound of the explosion of the tyre and that of the plane, as well as his extreme sensitivity to the sounds "kyar" "Kay" and "Arr" all play the role of mirrors reflecting the typical traumatic aftermath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British people's mind and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brain text shaped by the sound of wa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lso gradually clarify their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make their ethical choice through their affection for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und. The process of Septimus' enjoyment of the sound in his daily domestic life is a process of clarifying his affective commitment; the process of Peter's and Rezia's interpreting the song of the old woman is also the process of clarifying their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deciding on their ethical choice.

Keywords: *Mrs. Dalloway*; soundscape; brain concept; brain text; ethical choice

Authors: **Shen Fuy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Email: mti@sdu.edu.cn). **Wei Ji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modernist literature (Email: weijin1121@163.com).

《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 1925）是一部充满声音的小说，其中既有反复回响于整部小说的大本钟的声音，也有日夜不停的城市喧闹；既有空荡飘渺的老妇人之歌，也有让几乎所有人吓了一跳的汽车爆胎之音；既有天空中吸引万人注意的飞机轰鸣，也有家庭内部日常活动之音，甚至还有人物幻觉中的上帝之音、亡灵的声音及鸟的鸣叫。尽管如此，以往学界对伍尔夫小说的声音研究却多集中在音乐、城市噪音、现代声音技术与伍尔夫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鲜有学者专门研究伍尔夫小说中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特别是无人类含义的物理声音（meaningless sound）在人们的反应、接受、阐释、伦理选择等心理层面如何构建了声音景观，这种声音景观又如何表达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伦理等问题。

“声音景观”概念是由加拿大作曲家谢弗（R. Murray Schafer）于

《声音景观：我们的声音环境和为世界调音》（*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1977）中提出¹，而对“声音景观”做出比较确切定义的是汤普森（Emily Thompson），她认为声音景观就是“听觉的景观”（an auditory or aural landscape），它“同时兼具物理环境本身和对物理环境的感知方式”两种元素，也就是说，声音景观“既是世界，也是人类建构的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的文化”（1）。从认知学层面而言，声音景观的建构“将科学层面和美学层面听（listening）的方式与听者和其环境（即那个决定谁会去听什么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融合为一体”（Thompson 1-2）。换言之，声音景观既有科学层面“听”的物理性，更有美学层面“听”的文化性，以及听者对所听声音的选择、反应和阐释的主观性，所以声音景观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与大脑的活动密切相关。若用“脑概念”（brain concept）和“脑文本”（brain text）及人类的感觉、感知和认知等认知理论来解释声景的构建过程，运用脑文本与伦理选择的关系来研究声景在人类情感认同与伦理选择中的作用，无论是对于声音景观研究的深化和理论化，还是对于伦理批评的细化，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一、作为规训力量的声音——基调声音与脑概念

声音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弗拉塔罗拉（Angela Frattarola）所言，在以往的文学中，“人物常常被描写成对静默有一种先在的需求，但到了现代主义时期，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小说中都充满了声音”（134）。而对声音的关注（即从景观到声景的转向），“可以追溯到对扩张的声音的意识和对声音是人类感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强烈认识”（Cuddy-Keane 382）。可以说，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看似没有含义的纯物理声音（sound），如同人类发出的具有含义的声音（voice），同样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与脑概念的生成和脑文本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即是这类声音小说的典型。

在《达洛卫夫人》中，最普遍的声音是作为背景的声音。它们从时间上要么持续不断，要么出现频率非常高；从空间上弥漫整个城市，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耳边响彻；无论小说人物是否刻意倾听，这些声音都成为他们生活的背景。谢弗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基调声音”（keynote sound），即“最基本音调的支柱”（anchor of fundamental tone），它们常常为人所忽略，但“对我们的行为和情绪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Schafer 9）。这种作为背景的声音不仅仅是“悬挂在故事后面的声音幕布”，而且会“反转为不容忽视的故事角色”（傅修延 62），有着塑造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作用机制

1 该学者对文学中声音景观研究的重要性有非常敏锐的认识——“尽管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录音和分析技术来研究当代声音景观，但为了打下历史视域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文学和神话中寻找对听觉见证的叙述（earwitness accounts）”（8）。

体现为聂珍钊关于感觉、感知和认知三个阶段的渐进过程：“感觉、感知和认知的关系是从感觉到感知再到心理判断的认知逻辑关系”（“论人的认知与意识” 92）；这种作用机制更体现为聂珍钊关于脑概念产生机制的论述中：“我们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意象，触觉到的物品都会转化为记忆信息，即我们可以叫做脑概念的东西”（“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4）。具体到《达洛卫夫人》中，人物用听觉感官感觉到以工业化、商品化和帝国扩张为主要特点的20世纪初外部世界的基调声音，对这些声音与工业化、商品化和帝国扩张的关联有了感知，转化为记忆信息，形成关于声音与现代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脑概念，形成影响他们行为选择的认知基础。

在小说中，背景声音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伦敦街头的喧闹和大本钟报时的声音。首先，伦敦街头的喧闹是英国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缩影，或者说就是现代性滥觞的具象：“人们的目光，轻快的步履，沉重的脚步，跋涉的步态，轰鸣与喧嚣；川流不息的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胸前背上挂着广告牌的人们（时而蹒跚，时而大摇大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的乐声；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叮当的铃声，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伍尔夫 2）¹。在大都市商品化和工业化的大环境里，机械（工厂的机器和交通工具等）的轰鸣与喧嚣，各种广告手段（广告牌、用于广告宣传的乐队以及进行商品宣传的交通工具）都为人们的听觉所感觉，对其与商品化和工业化的关联有所感知，继而在头脑里形成对商品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认知，或曰脑概念——工业化和商品化带来繁荣，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幸福”。这样一种被大环境潜移默化植入的脑概念，对都市里的居民产生脱胎换骨的影响，使得他们沉浸于商品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快餐化的“幸福”追求中，使得连家庭主妇达洛卫夫人也深深爱上这种物质“幸福”：“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2）。

大本钟报时的声音是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的意识施行规训的缩影或“提喻”（synecdoche）²。乐·高夫（Le Goff）指出，发明于13世纪的机械钟表，其兴盛是城市公共化和商业化的时间意识替代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意识的结果，这种转变使得钟表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衡量一切的东西”（52）。借助钟表时间，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日程进行规范化，钟表时间由此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标尺和框架性标记，规训着人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休息，几点约会，几点前必须完成什么任务等。帝国主义借助对时区的划分、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规定等达到对全球殖民地的控制。可以说，钟表时间“是现代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机

1 本文有关《达洛卫夫人》的引文，除用英文标出的出处外，均出自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2 “提喻”指不直接说某一事物的名称，而是借事物的本身所呈现的各种对应的现象来表现该事物的一种修辞手段。

械”，充当了“衡量一切人类活动的度量标准和中心”（Mumford 14），成了协调国家和帝国必须的度量标准，是资本主义进行工作量化、实施管控、保证纪律的工具¹。这也就是大本钟为什么在《达洛卫夫人》中成为一种叠歌（refrain）一样的存在，以及大本钟报时的声音为什么在伦敦（也是几乎在小说每个人物心中）反复轰鸣的原因。“听！钟声隆隆地响了。开始是预报，音调悦耳；随即报时，千准万确；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渐次消失”（2）。在此，钟声不仅仅是背景声音，更是谢弗所谓的“标志性声音”（soundmark）（9），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甚至国家活动的坐标系，是人人都必须时时参照并借以校准自己活动的标识。

大本钟报时的声音对人们感觉、知觉和认知的渐次影响，与聂珍钊关于感觉、知觉和认知过程的研究十分吻合，这种吻合度恰好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借助时间声景对人类意识的温水煮青蛙效应。大本钟刚刚开始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好的幻象，钟声“开始是预报，音调悦耳”，似乎是工业化和商品化刚开始给人的关于繁荣、富足和便利的联想；大本钟报时的时候“千准万确”²，报出的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冷酷无情，似乎是人们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烂熟期开始感知工业化和商品化日益显现的负面效应，并感知其带给人类的人性异化和环境污染等残酷现实的提喻；报时后留下的声音余波沉重且向四方弥漫，逐渐淡出人们的听觉，似乎也暗合人们在比较理性的思索后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弥漫人间，日益沉重，虽似乎随时间流逝而淡化，但未必彻底消失。在经过感觉、感知和认知三个认识阶段后，人们在脑概念层面逐渐被钟表时间所规训。

钟表时间所起的规训作用又具象为大本钟报时的声音对英国不同阶层不同状态的男男女女的单一化作用。不论人物当时正在思考什么，大本钟声一旦响起，总能提示听者客观世界的存在，总能把他们拉回到商品化和工业化社会的生存法则中。达洛卫夫人听到大本钟钟声时联想到，“我们都是些大傻瓜。只有老天才知道人为何如此热爱生活，又如此看待生活，在自己周围构造空中楼阁，又把它推翻，每时每刻创造新花样；甚至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古董，坐在街头台阶上懊丧之极的可怜虫（酗酒使他们潦倒不堪）也这样对待生活”（2）。这里所谓的生活，无非是达洛卫夫人所热爱的伦敦的物质现实生活，也就是商品化和工业化在人们大脑中植入的追求富足物质生活的脑概念。正是这种脑概念促使人们“在自己周围构造空中楼阁，又把它推翻，每时每刻创造新花样”。即便是最底层的“可怜虫”或最保守的“老古董”，也在现代性社会打造的物质富足美梦中一再经历“追求-幻灭-再追求-再幻灭”的轮回。当然，还有一种背景声音是一战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但该

1 参见 Edward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2 英文原文是 irrevocable, 有“一去不返、无法撤消”之意。

种声音已经变形为赛普蒂默斯听觉中的死寂和他对声音的幻觉，以及人们对声音的奇特反应，故而在下面一节进行讨论。

二、作为规训结果的声音——直觉听觉反应与脑文本

“抽象的脑概念可以被加工成脑文本，储藏在大脑中”（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409）。其形成机制是“人的大脑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脑概念的组合形式也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不同变化的脑概念组合过程，就是不同的思维过程。思维是对脑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运用脑概念进行思维即可得到思想，思想以脑文本为载体”（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 33）。同理，多种声音脑概念在人们长期的现代生活经验中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在人的大脑中组合和修正，逐渐形成对声音、声景和声景背后的伦理关系的认知，生成作为关于声音和声景思想载体的脑文本，制约着人们对声音的下意识反应——直觉反应，以及对声音的伦理选择——情感认同。因此，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关于人对声音的反应和认同，可以反向推断人在意识层面的情感认同和伦理倾向，进而反向推理出塑造人的脑概念和脑文本的现实世界的情况。

在小说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达洛卫夫人对汽车爆胎声的直觉反应。当达洛卫夫人突然听到一声汽车轮胎爆胎的声音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啊！外面街上一声枪响！”（*Woolf, Diary* 10）¹。在达洛卫夫人生活的年代，汽车在中上层社会已经比较普遍，作为议员夫人的她对汽车应该也不陌生，而且她是20世纪初期常在城市街道上行走的女漫游者（*female flânerie*）²，应该比较熟悉爆胎的声音。她之所以对爆胎的声音的第一反应是一声枪响，是因为此时正值一战刚刚结束之际，她的大脑依旧还充斥着战争的声音，包括枪声、炮声等，这种声音对她形成了创伤性记忆，还形成了剧烈声响就是枪炮声、枪炮声就是危险临近的脑文本，而这种脑文本在潜意识层面控制着她的直觉反应。在这种声音脑文本的作用下，她听到爆胎声的第一反应是这种声音就是枪声，而不是爆胎声，也不是比较相似的鞭炮声或气球爆破声等，所以她才被吓了一大跳。小说通过对达洛卫夫人看似简单的误听的描写，生动揭露了战争之声对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即战争对人类心灵的戕害。

这种观点还可以通过人物对另一种声音的反应加以印证。当飞机飞过天空时，“飞机的隆隆声钻入人群的耳鼓，预示某种不祥之兆”（18）。当时的飞机已经不是陌生之物，人们听到飞机之声之所以感到刺耳，觉得“如钻头钻入”（*bored into*）耳鼓，且预示“不祥”（*ominously*），均是由于一战空袭所形成的脑文本：在人们的记忆中，飞机声已经与空袭紧密联系在

1 凡笔者根据原文进行的自译，均用英文标注出处，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Ching-fang Tseng, “The Flaneur, the Flaneuse, and the Hostess: Virginia Woolf’s (Un) Domesticating Flanerie in *Mrs. Dalloway*,”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1 (2006): 219-258.

一起。小说人物听到的声音本来来自于用于广告宣传的民用飞机，然而，由于长期战争在人们脑中形成的脑文本的作用，使得人群中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潜意识反应）是将其认为是轰炸机，其声音预示着不祥，令他们感到如钻头钻耳一样难受。这种创伤性过激反应还可以用伍尔夫日记里关于空袭的记录予以佐证。伍尔夫在其1917年12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她自己在凌晨五点躲避空袭的经历：25架战机袭击的噪声影响了人们的听觉，“使得人们被迫习惯于去听本来无法忍受的声音”（Woolf, *Diary* 85）。可以想象，小说中的人物如同伍尔夫一样，早已经将飞机声音与空袭在意识深处等同起来，并且与不祥画上等号，形成了将飞机声看作危险和灾难的脑文本，脑文本又使得他们在直觉中反应为刺耳和恐惧的感觉。通过描写小说人物对民用飞机的直觉性误听，伍尔夫表现了弥漫于民众心中的战争创伤。

长期的战争之音所形成的声音脑文本不仅造成人们对和平时期声音的误听，而且还会形成部分人对声音的屏蔽或幻听。从一战战场上归来的赛普蒂默斯没有听到汽车震耳欲聋的爆胎声，而是听到了旁边沃基斯先生说的一句口音极重的话：“休（首）相大人的机（汽）车嘛”（“The Proime Minister’s kyar” 12）。他极度敏感的神经似乎对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东西，特别是声音，无动于衷，予以屏蔽，而对和平时期日常生活中的图景和声音又极度敏感。他并未听到汽车的爆胎声，却因沃基斯先生的一句带有浓重口音的话而对经过身边的汽车产生了可怕的视觉联想：“他眼前的一切事物都逐渐向一个中心凝聚，这景象使他恐怖万分，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立刻就会燃烧，喷出火焰。天地在摇晃、颤抖，眼看就要化成一团烈火”（12-13）。他对汽车的联想看似纯粹的幻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饱受战争之害和弹震症折磨的人在疯癫中对统治阶级所犯的战争之罪的认知的外化。赛普蒂默斯在战场上目睹过枪炮将一切烧为灰烬、将人炸得血肉横飞后，在大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将战争与“燃烧”“火焰”“摇晃”“颤抖”“烈火”等恐怖景象联系在一起的脑概念，而且也逐渐将战争的罪魁祸首与那个普通民众致以崇高敬意的统治“中心”联系起来，在不断的伦理选择中形成了关于战争即是罪恶的脑文本。所以，当他听说汽车里坐的是首相时（普通民众有的认为是王后，有的认为是王储等），在他自己脑文本的制约下，他做出的反应是：里面坐着首相的汽车就是那个如魔鬼一般把世间万物凝聚在一起，并将其卷入到万劫不复的战火中的统治“中心”。这个中心带给人类的，就是“可怕的事情”，就是“燃烧”“火焰”“摇晃”“颤抖”和“一团烈火”，这使得他充满恐惧和愤怒。

赛普蒂默斯的这个视觉联想的脑文本作用机制，与后面小说文本中他对声音的幻觉作用机制可以互为佐证。沃基斯先生的话在他大脑神经中不断震颤，使他的大脑将统治中心与那辆王室或首相的汽车在声音脑文本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小说中其他人的直觉感知一样，这辆汽车在民众中影响深

远,就像其声音余波经久不散一样,“汽车虽已离去,但仍留下一丝余波,回荡在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帽子或成衣店里”(15)。这种余波看似力量微弱,但强化了听者对帝国的认同和对国家统治者的认可:“这种事汇集在一起却能产生惊人的力量,而且引起普遍的关注,打动人们的情感: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注视,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15)。身为帝国战争的受害者,赛普蒂默斯在疯狂中依旧可以直觉地感受到,这种万民敬仰的帝国情结其实是外表和谐而内里粗厉的存在。当用于广告宣传的飞机在天上书写字母时,一位保姆拼出“K”和“R”两个字母,赛普蒂默斯听到后却将两个字母变音为“Kay”和“Arr”,显然这与沃基斯先生说的“The Proime Minister’s kyar”中的“kyar”在语音层面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赛普蒂默斯的大脑中,“Kay”和“Arr”两个音节与统治中心的这辆“机(汽)车(kyar)”的发音有联系¹,才使得他觉得保姆原本低沉、柔和、“宛如音质甘美的风琴声”的两个字母发音,在他自己的脑文本中显得“带有一种蚱蜢般的粗厉声,刺激他的脊梁,并把一阵阵声浪传送到他的脑海里,在那儿经过激烈的震荡后才终止”(20)。原文中作者使用“rasped his spine”和“concussing”等词来描写“Kay”和“Arr”两个音节的发音,目的是突出这辆汽车所代表的统治势力对赛普蒂默斯所代表的参战士兵的心理戕害,哪怕是仅仅指涉它的词汇的发音就足以使得他们脊梁骨如锉刀锉磨一般难受,使得他们的大脑如患脑震荡一样痛苦。

三、作为伦理选择的声音——听觉认同与声音文本

脑文本决定着人的伦理选择,因为它“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33)。换言之,在认识世界、进行伦理选择过程中,脑文本影响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其中包括对本来客观的无人人类主观意愿的物理声音进行各种主观解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对本无人人类意志内涵的物理声音的解读,甚至可以帮助听者更加明晰自己本来不太明确或者本来不甚坚定的伦理倾向,完成伦理选择。这也就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达洛卫夫人》中人物的听觉和伦理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物通过在听觉上对某些声音文本的选择性认同,可以明晰自己的情感认同和伦理倾向。缝帽子的声音对赛普蒂默斯的心理安抚作用、彼得及雷西娅对街头老妇人歌声的不同解读等,无一不是人类脑文本在伦理选择中的作用在听觉上的具体表现。

雷西娅缝帽子的声音及其与小女孩玩耍的声音对赛普蒂默斯心理的安抚作用,是赛普蒂默斯逐渐形成的反战脑文本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具象化,即他的脑文本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具象化为他渴望借日常生活中的

1 参见 Garrett Stewart, *Reading Voices: Literature and the Phonotex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90.

私密和亲密关系来对抗公共领域，特别是帝国政治体制对自己的控制。赛普蒂默斯深受帝国政治体制之害，怀着为国而战的理想奔赴战场，但在无数战友的牺牲中逐渐认清自己只是充当了帝国主义利益争夺之战中的炮灰角色，同时他也深受弹震症之害，在其好友埃文斯战死后失去了正常的情感感知能力，产生强烈的幻听和幻觉症状，随时随地都可能听到埃文斯在唱歌，感觉到上帝发出的启示。他似乎也害怕这些幻觉，但总是无法阻止这些幻觉的出现，不由自主地受到它们的控制。但在他家里他参与了雷西娅制作帽子的过程，在听到雷西娅缝帽子的声音时，他的幻觉突然神秘消失了，真实的感觉重新恢复，而且这种声音似乎在他的幻觉和真实感觉之间架起一道屏障，阻隔了幻听幻觉对他的侵扰：“他觉得，她缝的时候有一种微声，仿佛炉子铁架上煮着水壶，冒出啾啾的水泡声”；在这种亲切熟悉的声音里，他无比放松，惬意地舒展身体，躺在沙发上，感受阳光和温暖，感到“温暖的空气逗留，微风迎面吹拂，恰似鸟翼在抚摸”（138-139）。在听到雷西娅与小女孩“一起嬉笑谑浪”时，“他感到慵倦，但十分幸福”（Woolf, *Mrs. Dalloway* 105）。甚至在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最怕的独处时刻时，因为有了这样的家庭生活声音，他就不再害怕；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下再看幻觉还在不在时，幻觉统统被一道声音所形成的屏障挡在外面：“至于那些幻觉、那些死者的面孔与声音，都消逝了？他面前只有一列屏风，上面显出黑油油的香蒲和蓝幽幽的燕子。在幻觉中一度呈现的山、脸、美，都杳无影踪了，惟有屏风”（140）。当然，这里的“山、脸、美”都是他幻觉里的东西，而那道屏风就是由日常生活中的私密声音构成的精神存在，能够把他的幻觉挡在外边，祛除他的精神病症，让他看到真实世界。这种声音屏障的威力如此明显，连雷西娅也感到“现在咱们是完全幸福的。此时此刻，她可以对他随意聊天，想说什么便说什么”（140-141）。

赛普蒂默斯对日常生活中家庭私密声音的心理依赖，至少可以说明关于脑文本作用机制的三个问题：其一，作为思想载体的脑文本相对而言是稳定的，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作用的外化形式是多样的，在许多情况下是隐匿的，甚至会通过对某些看似没有多少人类语言意义的声音的认同表达出来，而这种对无明显意义的声音的认同其实是一种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背后又往往隐含着某种伦理倾向；其二，脑文本影响下的情感认同，许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潜意识状态的选择；其三，脑文本影响下的情感认同，会通过某种具有疗愈作用或愉悦感觉的声音的情感认同表现出来，而这种疗愈或愉悦会带给身体感官疏解放松之感，身体的愉悦反过来又会强化脑文本的情感和伦理倾向。另外，至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声音为什么对精神病人赛普蒂默斯具有疗愈作用，恐怕与作为私密领域的家庭日常生活与严苛的公共社会生活的不同有关，因为家庭日常生活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逃避现代生活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力量”（Tung 97）的场域之一。

如果说上文中赛普蒂默斯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情感认同是脑文本影响下的情感认同和伦理倾向,那么彼得和雷西娅对街头老妇人的歌声的不同解读则反映了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伦理选择,这种不同的伦理选择会以对相同的无明确意义的声音做出不同的伦理阐释外化出来;更重要的是,彼得和雷西娅对老妇人之歌的不同阐释还反映出:通过对阐释空间巨大的、含义模糊的声音的阐释,人们大脑中可能不太明晰的情感认同和伦理倾向会变得更加明晰,甚至会使得某种不太坚定的情感认同和伦理倾向变得坚定稳固起来。

彼得对于爱情的伦理倾向就是在对老妇人之歌的阐释中变得越来越明晰的。他从旧日情人达洛卫夫人家出来,对于她嫁作议员夫人而自满得意的表象深感伤心,心中无比渴望永恒的爱情,但这种永恒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心中并不是太清晰。恰在此时,他正好赶上一位在公园门口乞讨的老妇人唱着让他似乎无法辨清含义的歌:“一种纤细、颤抖的声音,像气泡一般不断冒出,了无方向,毫无活力,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只是轻微地、尖利地飘荡着,听不出丝毫人间的意味: ee um fah um so foo swee too eem oo—”(76)。对于这样一首歌,不同学者做出过不同阐释,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均认为这首歌的设置与小说的结构和风格设置相关。¹但笔者认为,从上下文看,对这首歌的描述很显然是从彼得的视角出发的,也可以说是彼得对老妇人这首歌的阐释,即这歌声既无人类的意味,也没有方向、时间或活力。沿着这种阐述,彼得对老妇人及其歌声展开的想象也是他对永恒爱情的想象:老妇人乃是宇宙时间维度的存在,已经存在了千百万年,她的恋人与她终生相爱,在几百年前如山崩地裂般逝去。她为他唱的爱情歌曲,也是普世永恒的存在,既无性别的区别,也未被时间淹没,从混沌未开一直被唱到当下。在这亘古的爱情歌曲里,彼得似乎听懂的只是歌曲结束之时老妇人说的“用你那甜蜜的眼神注视着我的眼睛吧”以及“把你的手给我,让我温柔地抚摸吧”(77-78)。显然,彼得对永恒爱情的认识通过对似乎无意义的纯粹声音“ee um fah um so foo swee to eem oo—”的阐释,逐渐变得清晰,那就是没有功利、不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理想的永恒爱情;他对老妇人之歌的阐释过程也是他爱情伦理倾向明晰化的过程,也是他脑文本在调适重组他爱情脑概念的过程。

对同一个人唱的同一首歌,深为丈夫精神病苦恼的雷西娅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反应,从而坚定了她不同的伦理选择。雷西娅身处异国,带着在一战中患了弹震症的丈夫求医问药,但由于霍姆斯医生的无知,其丈夫的病情未有任何好转,这使得她感到越来越无助,在心中十分渴望在世能得到温情和怜悯。恰在此时,她听到老妇人的歌声,不禁感慨:“可怜的老婆子”,“啊,可怜

1 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伍尔夫描写老妇人唱的歌的目的是创造小说的重复结构。克莱门茨(Elicia Clements)认为伍尔夫用无意义的歌曲语言使其小说音乐化、散文化,试图在小说中模仿音乐艺术形式的韵律感。

的悲惨的老婆子”（78）。并对老妇人的可怜情况进行了想象：“倘若这是个雨夜？倘若那老妇人的父亲，或者在她生活如意时认识过她的人，凑巧经过这里。”从小说上文看，雷西娅似乎一直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对所处境境既无奈又伤心，“连续几星期以来，雷西娅都闷闷不乐（……）有时候，看到面目善良的人们，她几乎觉得必须在街上拦住他们，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不幸福呢’”（78）。但在对老妇人的这种类似自己但比自己还惨的境况充满同情的想象中，老妇人的歌词“即使被人看见但又何妨？”令雷西娅突然顿悟，做出了勇敢面对困境的伦理选择：“那老妇人在街上唱着‘即使被人瞧见但又何妨？’的歌，使她忽然感到一切都会好转（……）她感到，不幸福的感觉完全是愚蠢的梦幻”（78-79）。

从表面看来，彼得和雷西娅在听到同一首歌的时候，表现出不同的伦理倾向或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但他们的伦理倾向和伦理选择与这首歌的关系是一样的。在听到这首歌时，他们均处于情感的漩涡，或者说人生的困境，一个为爱情所困，一个为丈夫疾病而苦恼，都处于被置之死地的境况；既然被置之死地，就有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欲求，但这种欲求在他们脑中还只是一种脑概念，尚未清晰地形成能够控制主体形成清晰的伦理认知或坚定的伦理选择的脑文本。而老妇人这首总体上没有明确含义的歌声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性，能够诱发走出困境欲求清晰化和明确化的潜质。所以，对于彼得和雷西娅而言，与其说是老妇人的歌声促使他们做出伦理选择，毋宁说是他们走出困境的模糊欲求，即某种求变的脑概念，在他们对某种含混的声音的解释中变成对相关问题进行清晰思考后的脑文本，这种脑文本使得他们的伦理选择也愈加清晰。用克莱门茨的话说，因为老妇人的歌声具有“拒绝固定意义”（47）的特质，所以才成了“彼得和雷西娅两人意识的联结”（49），甚至是“小说中伍尔夫建构的社会和物质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51）。而这种社会和物质网络，其中一部分就是声音景观中被听者通过脑文本的活动建构出的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并促成人们伦理选择的文化。

这种对同一声音文本不同的阐释带来的伦理选择，在本质上也符合聂珍钊关于脑文本在传输过程中所受干扰因素的论断，“原初脑文本（initial brain text）受到年龄、疾病、情绪、环境及其他因素等形成的记忆缺憾（memory defect）的影响”（“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411）。老妇人所唱的歌，可以看作是正在通过口头传输的原初脑文本¹，彼得与雷西娅对原初脑文本的接受和阐释受到他们当时的心情和环境的影响，虽然未必是他们的记忆出了问题，但总归是形成了不同的再生脑文本（second hand brain text），并且在这

1 关于老妇人所唱的歌的原初文本，米勒认为是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Allerseelen”（“All Souls”），伍尔夫在小说中使用的是这首歌的英文译文，并对其进行了部分重写和改写（189-190）。克拉克（Stuart Clarke）提出，伍尔夫在写到老妇人之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拉森（Eduard Lassen）的歌而非斯特劳斯的歌曲（Clarke 50-52）。

个过程中，他们的伦理选择和情感认同变得越来越清晰。关于这种在对声音文本不同阐释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选择和情感认同机制，在文学研究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参照聂珍钊关于脑概念、脑文本与伦理选择的论断，我们可以发现声音景观的生成机制：《达洛卫夫人》中的现代声音对人的意识起到规训作用，在感觉、感知和认知等层面形成人物对现代性初步认识的脑概念；人物对声音的直觉或潜意识反应是小说人物在长期的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积累过程中不断对脑概念修正、重组而形成的脑文本对小说人物的意识产生影响的具象化，这种反应可以帮助读者反过来推理小说人物的脑文本；原初脑文本在形成再生脑文本的过程中深受环境、情感和情绪等的影响，在受影响的过程中也完成情感认同和伦理选择的明晰化过程，换言之，小说人物对声音的认同或阐释过程，也是他们情感认同清晰化和伦理选择坚定化的过程。运用伦理批评，我们可以管窥现代社会声音景观形成的过程和心理机制，进而发现声音对于现代意识建构的作用，深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反过来，通过研究现代社会声音景观形成的过程和心理机制，我们也可以验证和丰富伦理批评在听觉认知向度的成果。

Works Cited

- Clarke, Stuart N. "The Old Woman's Song in *Mrs. Dalloway*." *Virginia Woolf Bulletin* 17 (2004): 50-52.
- Clements, Elicia. *Virginia Woolf: Music, Sound, Language*. U of Toronto P, 2019.
- Cuddy-Keane, Melba. "Modernist Soundscapes and the Intelligent Ear: An Approach to Narrative Through Auditory Perceptio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382-398.
- Frattarola, Angela. "Developing an Ear for the Modernist Novel: Virginia Woolf, Dorothy Richardson, and James Joyc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1 (2009): 132-153.
- 傅修延：“论音景”，《外国文学研究》5（2015）：59-69。
- [Fu Xiuyan. "On Soundscap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5): 59-69.]
- Le Goff, Jacques.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0.
- Miller, J. Hillis.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2.
-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Kritika Kultura* 37 (2021): 402-418.

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Nie Zhenzhao.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浙江社会科学》10（2020）：91-100+159。

[—.“On Huma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 (2020): 91-100+159.]

Schafer, 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7.

Stewart, Garrett. *Reading Voices: Literature and the Phonotext*. U of California P, 1990.

Thompson, Edward P.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Thompson, Emily.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Minnesota: The MIT P, 2002.

Tseng, Ching-fang. “The Flaneur, the Flaneuse, and the Hostess: Virginia Woolf’s (Un) Domesticating Flanerie in *Mrs. Dalloway*.”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1 (2006): 219-258.

Tung, Charles M. “Modernism, Time Machines, and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Time.” *Configurations* 1 (2015): 93-121.

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England: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2003.

—.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translated by Sun Liang and Su M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